

〈调查研究シリーズ 120〉

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的历史片段及作用考略

李 珊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依据中日教育交流相关协议，于1979年3月设立在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内，是战后中日教育文化交流的最大项目。37年来，培养了日本文部省讲学金项目学生4000余名、各种培训班通过学习日语留学日本或从事与日本有关工作的学生10000余名。从建校至今，日本方面派遣了以东京大学为首，东京外语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一桥大学、冈山大学等院校的教师500余名，与中国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

从办学规模、时间长度、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等几方面来看，该学校的贡献值得肯定。再从人际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角度看，37年来，1万多中国人赴日留学或从事与日本有关的工作，接触和融合于日本社会；5百多名日本的大学或中学的老师在中国工作、生活，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给日本社会各阶层带来一定影响，对日本人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起到促进了作用。因此说除了人才培养的层面外，留日预校作为中日交流的渠道和平台，在中日文化教育交流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贡献。本文主要参考前辈学者酒井顺一郎教授的《改革开放的天之骄子》（日本 冬至书店，2012年10月）、郑国爱、张群舟、马军合编的《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在中日教育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张群舟主编《时光的印记、辉煌的篇章——纪念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成立35周年——》（东北师大出版社 2014年）等论著，又对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常务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冰进行了采访，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力求对留日预备学校的几个历史片断和贡献进行简要的回溯，最后对在当下中日两国紧张和对立给留日预备学校以及中国日语教育带来的影响做以分析。

一、 成立背景

1978年，对于二战后的中国历史和中日关系史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尽管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但中国的文革并未结束，受当时意识形态及冷战思维的影响，中国尚未敞开大门，两国关系难有大的作为。1978年，中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决定在已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当年邓小平访日，开启了中日交流的新时代。当时的中国，携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国家

到民众的层面，都急需敞开国门，呼吸新鲜空气，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的经验，极力推进现代化建设。而邓小平的访日，通过反复播放的纪录片，让中国人看到了日本优雅的传统性与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的完美融合，看到了日本高效率的产业和高度发达与普及的教育，以富士山为背景高速行驶的新干线、美丽的岛国风光，这些令中国人大开眼界，目瞪口呆，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新一代学习日本的热潮。

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做出要向国外大力派遣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指示。“中国教育部该年决定从高中毕业生和大学一年级在读生中选拔本科留学生。选拔后接受留学预备教育再派往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大学。预备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派遣地的语言教育”。¹⁾ 1979年教育部首先在六所外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设立出国留学生培训部，计划招收3500名学员，翌年在北京语言学院也成立了出国留学生培训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济大学设立了针对留学联邦德国的赴德预备校、在吉林师范大学（1980年改为东北师范大学）设立了针对留学日本的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²⁾ 1978年12月，以日本文部省学术国际局局长筱泽公平为团长的教育代表团一行访华，双方就派遣留学生事宜进行了会谈，其后签署了教育交流协议，达成了互派留学生的共识。

教育部经多方考察决定将这所学校设在东北师范大学。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的日语教学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但当时的教学条件和生活水平在全国来说都相当低下。该校克服了在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勉力承接了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日语培训任务。

筹备建立留日预科时期有两大困难；一是当时因文革的影响，学员的学历参差不齐。据酒井顺一郎调查：“中国的学制很复杂，大概是五、三、二制，而日本是六、三、三制。也就是说，按中国的学制要进入日本的大学学习，其修业年限差两年。日本文部省听取了大学设置审议会大学基准分会、国立大学协会第二常设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了谨慎的研究，最终于1979年8月24日公布了对日本学校教育法部分修改的决定：根据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第69条第一号规定，等同于在国外受过12年教育毕业者有如下学校：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东京都）、国际学会日本语学校（东京都）、关西国际学会日本语学校（大阪府）、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对此酒井评价道：将海外的教育机构适用于日本的学校教育法，这是前所未闻

1) 段耀中《现代中国人的日本留学》日语版，明石书店2003年16页，转引自酒井顺一郎《改革开放的天之骄子们》（日语名『改革開放の申し子たち』）冬至书房2012年10月54页

2) 郑国爱、张群舟、马军合编《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在中日教育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的”。³⁾ 我们可以认为，为了使中国学生顺利赴日留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70 年代末，日本各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付出了艰苦努力。据当时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工作、为筹建留日预校和大平班做出巨大贡献的椎名和男先生回忆：“我和时任文部省中国特别事业担当课长、文部省学术国际局企划调整课课长的川村恒明，坐夜车从北京赶往长春，大半夜到空无一人的餐车，两人喝着高粱白酒，一边兴奋地讨论着留日预校、日中教育交流的前景，这一晚的情形就是 30 多年后的今天，也难以忘怀”。⁴⁾

另一个困难就是日本教师的宿舍问题。因新建专家公寓需要时间，而学校开学在即，这不是当时的东北师大容易解决的问题。于是，学校就向吉林省政府汇报，寻求支持。最后由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特别出面协调，定在南湖宾馆。徐冰推测说：“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省委书记特别繁忙，而即便是东北师大校长、党委书记也很难见上一面。充当师大和省委书记之间联络工作的，有可能是王北城。王北城是中共省委书记王恩茂的儿子，是师大 77 级日语专业学生，我们同班同学。那阶段，学校领导常常来找他，有时正上课就突然被叫走”。⁵⁾ 可以认为，正是中日双方从政府到民间，大量人士的共同努力，才使预校得以建成。

二、历史沿革片断

1979 年 3 月 22 日，留日预校正式开学。建校伊始，由第一期伊藤芳照团长主持整个日语教学，日方教师主讲，中方教师配课。采用的教学法基于直接法，后来被称为零起点的基础阶段强化教学。

第一期学生共选拔了 100 人，其中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四所名校就占 62%，是千万人中选出来的佼佼者。第二期 102 名，其中有 5 名文科学生。第三期 100 名。自第四期开始，学生数骤减，第四期、第五期分别为 50 名到 30 名。⁶⁾ 据留日预校首任校长陈彬回忆：“1980 年出现了重新审视本科留学生派遣工作的呼声，同年 11 月，中央书记处第 61 次会议中决定缩小或终止本科生，改为派遣研究生。”⁷⁾ 可以认为，1977 年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这是对被文革破坏的考试制度恢复的重大举措，而随着形势的稳定和教学水平的提高，研究生的培养便提到日程上来，必然要调整学历层次，尤其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政府决定留学政策以大学院为主，本科留学生人数有所限制。

3) 酒井顺一郎『改革解放の申し子たち』冬至書房 2012 年 第 60-61 页

4) 张群舟主编《时光的印记 辉煌的篇章——纪念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成立 35 周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第 50 页

5) 笔者对徐冰教授的访谈记录

6) 同上 2，第 48 页

7) 转引自上二，第 48 页

第四期终止派遣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生，派往日本的本科留学生因双方协议为5年，因此至1983年终止了第五期本科生留学计划。”⁸⁾

1982年，预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生第一期到第五期，学制为1年，而硕士研究生则缩短为半年，每年招收学员50名左右。而随着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自198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终止了硕士生的培养与派遣，6年来总共招收硕士生400余名。⁹⁾

1989年开始，留日预校学员均改为博士研究生，学制10个月。此后，自1996到2006年的10年间，还招收了10届赴日留学博士后学员。

自1985年2009年，受新疆教育委员会委托，连续招收了24届新疆班学员。该项目结束后，当年在这里学习的一些学员又把子女送到该校学习日语。2004年到2008年，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培养了一大批学员。¹⁰⁾

可以说作为非学历教育、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其日语教育是在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质量最高的学校，由中日两国政府合办、中日两国教师共同培养的学生自70年代末至今，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业绩与贡献

通过对研究留日预校历史的前辈学者先行研究的考察和对中日双方教师与学生的采访及调查，可以发现，他们大都认为留日预校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对日交流、对中国日语教育的推动作用等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的坚实基础

如今从留日预校走出的学员，大多数成为我国各领域的高端人才，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发挥着骨干核心作用。84级刘忠范，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纳米信息储存技术与材料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江雷、清华大学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主任罗毅等人，都已成为全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利用所学创建了在国内尚属空白的学科，大大缩小了我国科研水平与世界科研水平的差距。在管理领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王训练、新疆大学副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上海师大校长朱自强、贵州大学党委书记郑强、同济大学副校长陈以一、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祥、原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现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走上大学校长及省市等领导岗位。此

8) 同上2，第49页

9) 笔者据《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校友录1979-2009》统计

10) 同上

外，还有一大批活跃在中日两国经济界的实力人物。

2、孕育中日友好使者的摇篮

徐冰教授回忆到：2014年暑假，1984级硕士班同学回预校，座谈时叶金花同学谈到：“我记得当年徐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我写了将来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当一流的科学家；另一个是成为中日交流的友好使者，今天来看，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留日预校为我们搭建了重要平台，我们由衷地感谢留日预校！”叶金花同学毕业于东京大学，现已成为一名科学家，活跃于中日教育科技领域，2002年日本国家广播公司（NHK）在日本新年特别节目中对其进行了专门报道，如今，她的儿子也考上了母亲的母校东京大学。¹¹⁾

留日预校张群舟教授回忆：担当1984年硕士留生日语教师团团长河原崎干夫助手的徐冰先生20年后在东京再次与河原崎先生相会之际，河原崎先生谈到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并拜托徐冰：“她在日本留学，但因学科不同，论文的事情请多加指导”。那位留学生的父亲曾是1984年在留日预校河原崎先生所教过的学生。关于这一点徐冰先生做了如下叙述：“我非常感动。中日交流发展到了下一代，关照完父辈，这回又轮到其女儿了。先生对中国留学生的热情指导和期望已超越国界，我们虽不是鲁迅，但先生‘却像藤野先生一样指导我们、呵护我们。想到这些，感慨万分，要继续努力奋斗，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桥梁’。¹²⁾

尽管在这里的学习时间不到1年，但留日预校毕业生都将学校视为母校，充满感情。很多学生毕业多年后重返母校，还有多届校友捐赠了樱花树。同学们都发自内心地地感谢预校，通过学习日语和留学日本，为他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开拓了人生与事业的一块崭新平台。

3、了解日本、对日交流的窗口

为使学生尽快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留日预校在语言教学的同时，注重向学生们输入日本文化常识，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也同步为学员开启认识日本历史、文化和风俗的窗口。留日预备学校每年举办日本文化节，对东北师大同学及附近市民公开，有日语节目演出、剑道表演、日本茶道、插花、日本饮食体验，如寿司、酱油，还有穿和服等活动，深受欢迎，使大家得以了解独具风情的日本文化的一些元素，传播了日本风俗和文化。

在留日预校，同样让学员感受深刻的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生活模式、审美意识等无不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日本文化，细品味，又别样不同。数千年的文化交流中相互学习，两国形成了既相似又迥异的文化风格。

11) 同上5

12) 张群舟“留日预校35周年·硕士3期校友毕业30周年纪念会致辞”张群舟主编《时光的印记 辉煌的篇章——纪念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成立35周年》东北师大出版社2014年9月21页

自留日预校成立以来,中日两国高层都相当重视。2009年,郝平副部长专程参加预校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并植树留念;1984年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森喜朗访问预校,出席学生毕业典礼;2016年6月6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专程访问预校并赠樱花树;日本驻华大使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多次来访;日本官方与民间团体经常与留日预校开展各种交流。84级硕士班刘忠范同学回忆:“记得当时的文部大臣森喜朗曾经到预校访问,在单调的学习生活中掀起了小小的涟漪。后来到日本留学时,他还热情地接待了几位留学生代表,本人也有幸参观了他的官邸,兴奋了好几天”。¹³⁾可以说,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已然成为战后中日教育、文化交流的窗口和重要平台。

4、当代中国外语教学改革的嚆矢

在中国,即便是今天,不论外语专业还是共外的教学,大都是翻译教学法的一统天下。所谓翻译法,就是老师夹着一本书来上课,用学习者的母语讲生词,再讲语法,做点练习,最后把课文翻译成中文。这种教学法的最大弊端是使学生学到了语言知识,但未学到语言技能,即实际应用能力,致使“哑巴外语”的现象随处可见。

而留日预校的基础教学,主要是由东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们担任。1979年刚建校时,学制是一年,学生们学习一年日语,就得通过日本的考试,直接进日本的大学听专业课,这种难度超乎想象。以伊藤芳照教授为首的日本专家团,凭借扎实的外语教学法理论和在海外教授外国人学日语的丰厚经验,结合中国学生的实际,创造性地实施了直接教学法,就是从零开始直接使用日语,基本不讲语法。一开始学生难以适应,要求老师讲语法,但预校坚持不变。学生毕业时说:老师不教语法,但语法都学完了。这种教学法给当时的中国外语教学界吹进了春风,《光明日报》(1981年3月19日)发表长文报道了留日预校的暂新的教学方法,认为“在东北师范大学进行外语教学的教师们的教学指导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成绩又快又好,令人惊奇”,这些报道使得留日预校的教学法获得了中国社会的关注,各高校纷纷要求前来学习。

徐冰回忆:“当时我们是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非常自负,一年级就被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日本一米七轧钢工程借调做翻译,听来武汉看我们的董将星老师介绍了留日预校的成立,和预校使用的教学法,大家既新奇又兴奋,回校后就强烈要求日语系也使用这种方法教我们。当年东北师大日语系和留日预校还是一家,于是便近水楼台,于1983年率先引进了这种基于直接法的日语强化教学经验,取得成功,于1984年年底,在我校召开了《全国日语专业基础阶段强化教学研讨会》,各校与会代表听课,观摩了一、二年级的教学,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的北大顾海根教授问二年级学生,你们是几年级的?学生回答:大二上学期。顾先生感叹

13) 同上,第34页

道：“我们北大就是大三学生口语也达不到这个程度阿！”¹⁴⁾

1993年，东北师大日语系靠基于直接法的基础阶段日语强化教学的经验和成果，获国家优秀教学二等奖。

东北师大校友、现任北大日语系主任的金勋教授2013年在天津外语大学的学会上说：“北大日语系的教学，要向各兄弟院校学习，比如东北师大，我就是这个学校毕业，被用直接法教出来的”。

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李俄宪教授来东北师大交流，听了东北师大日语系教授的课，提出请东北师大教师到华东师大上课，让华东师大日语教师到东北师大来学习的建议。

同年，哈尔滨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王琪老师带领60多名学生，来东北师大观摩教学，学习直接法。¹⁵⁾

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与直接法的缘分，徐冰又谈到了伊藤芳照先生：“1982年春天，伊藤先生又一次来留日预校执教，因为派遣的学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本科生又增加了研究生，估计伊藤老师的任务是因教授对象的改变而调整原来的教学方法。那时我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留日预校教书，于是便有幸听了伊藤老师的课。直接法教学，主要包含两个环节：即导入和训练。就是说，教师首先教授新单词，然后讲句型。当然，都是用日语，原则是利用卡片或实物、图片，或用学生已知的词汇讲授新内容。当学生明确无误地理解了之后，就进入练习，伊藤先生的特点是从容优雅，让学生充分放松，然后一环扣一环，使学生理解语境，再展开训练。伊藤先生是我得以了解日语直接法的启蒙老师，终生的恩师！”¹⁶⁾

1984年春天，徐冰又遇到了事业成长道路中的另一位恩师，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语学校教授的河原崎干夫先生。

“河原崎先生来之前，我就从日本老师那里听说他是日本从事日语教育的顶级高手，任新一届教师团的团长，而我有幸做他的助手。河原崎先生会说单口相声，快活幽默，尽管教授外国人日语多年，那几个句型单词早已默然于胸，但依旧兢兢业业地备课，简笔画惟妙惟肖，都选用班级里的同学，以大家身边的事物为素材，简笔画一拿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谁，一片笑声。于欢笑声中不失紧张和高频率的练习，使原本枯燥无味的外语教学成了欢笑中传达知识的快乐活动。我听傻了眼，原来外语课还可以这么上！”

在负责整个教师团的工作之外，河原崎先生还指导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老师，交给我们如何做教案，找出教学重点等。”¹⁷⁾

14) 同上5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在日本老师言传身教下,中国老师逐渐成熟,成为后来传播直接教学法的骨干力量。徐冰于2005-2009年任大连民族学院外语学院院长期间,顶住教师和学生反对的压力,在该校日语专业引进了直接教学法。利用暑假培训年轻教师,他聘请了东北师大外语教学法专家的李玉贤教授,给老师们讲授外语教学法的各种流派,又邀请东京外语大学的楠本彻也教授,展示用直接法上课的实例和要点。原本各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在课间很少有人讲外语,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在走廊就时常听到有学生说日语了。

中国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会,自2010年起设立了“卡西欧杯全国日语专业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邀请全国高校日语教师参赛,当年大连民族学院青年教师黄英兰获二等奖,翌年郭勇获一等奖,下一年高希敏获三等奖,次年杨柏宏获三等奖;徐冰重回东北师大工作后,继续组织推进直接法,派青年教师参加该赛事,2012年池睿获一等奖、2013年刘德萍获三等奖、2014年王欣获三等奖、2015年李飒获三等奖。在全国的平台上,采用直接法的教学,如此大面积的获奖,反映了中国外语教学界对该方法的充分肯定和该教学法的效度与可推广性。¹⁸⁾

留日预备学校还有另一个名称“中国教育部出国外语培训部。”除了培训日语外,自2003年,又承担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培训中国各高校教师赴欧美留学的任务,主要教授英语,其特点依然是非学历教育,短期强化培训。因性质相近,英语教师吸收日语直接法的经验,移植到英语课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国11个出国培训部当中,东北师大培训部在2015年、2016年的全国统一考试中,连续两年成绩排在全国第一。¹⁹⁾

笔者认为,非母语的学习,亦即作为外语的习得行为,全世界的同行都在思考和探讨,如何使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用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学到一门地道的外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层出不穷,实践探索五花八门,而被实践所证明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值得推广的。东京外语大学开创的这种直接法,通过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走入东北师范大学、辐射到大连民族学院,进而影响到北京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并且,还从日语感染到英语,所取得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推广价值。前述的李玉贤老师,“在日本留学期间,将其用于对日本人的汉语教学中”,据说效果很好。²⁰⁾那末,这种方法对于日本的汉语教育是否有效?能否对于我们熊本学园大学东亚学科的汉语教学引发点滴思考?这值得探讨。

徐冰谈到:在回访母校的校友们的反馈中,听到他们有感于在预校学习日语时进步之快,所学内容之灵活实用,老师们在欣慰之余,又增进了在教学中精益求精的动力。这种良性的发展使留日预校在为国家培养现代化高端国际人才方面持续地发挥着开外语教学先河的作用。

18) 同上

19) 据留日预校“国家留学基金委”内部统计资料

20) 转引自酒井顺一郎对李玉贤的采访2009年5月12日、同年6月24日于长春,同上2,第96页

四、从当下中日关系看留日预校及中国日语教育的前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个让人怀念的时代。随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国宣布放弃追求战争赔偿、日本战争孤儿回国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援助等一系列互相展示诚意、示好，中日关系出现了战后友好交流的高潮。在教育领域，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的建立、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教育部高校日语教师培训班（俗称“大平班”）”的开设，都成为当年的标志性事件，并促进了中国日语热的形成，进而推进了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笔者亲身经了这个时代。

1982年夏季，中日之间发生了“教科书事件”，原本时任日本文部大臣的小川平四郎预定访问中国，但因该事件而未能成行。1984年8月，森喜朗为修复两国关系，提出访问中国，参加留日预校的毕业典礼，得到中方的欢迎，遂于28日访问留日预校。徐冰当年为森喜朗做翻译，还记得在吉林省政府招待会上森喜朗的讲话片断：“我姓森，听说长春被誉为森林之城，能够访问这个城市，我非常高兴，今后愿为这两个森的友谊尽绵薄之力，其讲话获得了满场掌声”。²¹⁾

2016年6月6日，在中国人认为有缘份、喜庆、顺利的日子，尽管中日关系紧张，但时隔32年，驰浩文部科学大臣访问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向预校赠送了10棵樱花，和东北师大校长植树纪念，又与师生进行了亲切交流与合影。通过跨越32年时空的日本文科大臣的访问，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恢复中日关系所作的努力，也可看出该学校在中日教育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原因非常复杂，可以举出诸如岛争、东海油田问题、两国对于历史认识的差异、中国经济增长给日本带来的心理影响、中国军力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示强等因素，但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因日本的主动配合，造成了两国政治利益的冲突。而两国诉求的对立，则在各自的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巨大的杀伤力，致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两国政府与民众两个层面的民族和解的善意与努力，几乎前功尽弃。除了政府的立场，民间的相互蔑视和抗争意识不断抬头，以官方为背景的各种媒体的添油加醋，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做法也给中日关系造成了障碍。

譬如，多年来，中国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所谓“抗日神剧”。对于中国人对日观的形成路径和影响因素，徐冰认为中国的影视作品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三十几年前，他就写道：“从形象塑造的角度看，不论是山田还是松井，鸠山还是岗村，似乎都是一副面孔，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的印记；从故事发展的情节来看，常常雷同，中国人几场埋伏、几次冲锋，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最后，

21) 同上5

日本人或剖腹自杀，或缴枪投降，影片以大团圆结束，观众们热烈鼓掌之后，十分满足地走出电影院。这种描写手法，尽管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也符合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心理，但却有悖于历史事实，也无法解释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²²⁾

“新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日本人，常常是丑恶的侵略者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作品的情节或许被人们忘掉，但黄色的军服和闪亮的刺刀，却长久地嵌印在当代中国人的脑海中”²³⁾

上述情况还是在三十多年前，在今天，情形则更加不堪：笔者每次回国只要打开电视，不论白天黑夜，24小时，肯定有频道在播放“抗日神剧”。“抗日神剧”这个词，是中国老百姓制造的，是指那些所谓“手撕鬼子”、“赤手拼刀”的胡编乱造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反映了即便是对中日关系、日本概况不甚了了的大众的不满。就连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好多人都说：只要是这类神剧天天播放，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没个好。

事实上，中国百姓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日之间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给中国的日语教育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仅就笔者前次对长春市日语教育状况所作的大概的调查所知，某所日语教育历史悠久、排在全国前列的高校，日语专业第一志愿的学生大幅下滑，招不满，只好采用学校调剂的方式保证生源。同样，因生源减少，长春市的××大学的日语专业已停止招生，日语教师处于无课可上的状态。因前述电视剧中出现的中国人，有一些是会日语的翻译，而日语翻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致等同于叛国者，亦即汉奸。由战前思维延展到战后，或许在学生家长的心目中会想到绝不能让孩子将来从事这个行业，进日本企业未必会有好的前途。

除了旧式日本军人作为杀人放火的魔鬼被反复强化的日本人形象之外，中日经济合作的退化也是影响中国日语教育稳定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前些年，尽管两国之间政治冲突频发，首脑时而言辞激烈，但在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仍在进行，这种现象被媒体和学者概括为“政冷经热”。

对中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来说，毕业后的去向大致有以下几条：1、考研；2、出国，即留学日本；3、进入日资或中日合资企业；4、改行。能够考上研究生的毕竟属于少数；赴日留学如果自费，对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支出；改行则是不得已的选择，于是进入日企就是许多人的努力目标。

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的大连地区，是日企传统投资置业的区域，也连带性地刺激了周边乃至其他地区日语专业的扩大招生。即便是在“政冷经热”的时代，这些基于应对市场需求而扩招的院校尚能生存，但假设出现“政冷经亦冷”的情形，对全国日语专业就业市场的打击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22) 徐冰《当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北石主编《战后日本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5年8月 296页

23) 同上，第297页

事实上，2016年9月20日日本经济界访华团的来访，要求中方“统一处理海外企业撤出中国市场的手续”，就已经向中国发出大规模撤出中国市场的明确信号。其原因很多，如从经济自身的要素来看，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成本，由劳动力工资不断上升的中国，转向东南亚等人工费较低国家和地区，当属正常，而按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和法律保护投资方的利益，这种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则反映出中国市场化的不健全，令日本企业无奈。而两国政治冲突的不断升级，且短期内难以解决，或许反映出日本经济界、在华日企的真正担忧。

这样的情形，有可能真的导致“政冷经亦冷”局面的发生。国家间、国民情绪的对立，影响到两国的民生，实在是得不偿失，愚蠢至极。而中国的日语教育抑或是日本的中文教育，都有可能面对这种长期低迷的状态。

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其后两国政府之间产生重大矛盾冲突，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倒退时，中方政府都提倡“以民促官”方针，并大致形成了一条固定的政策。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不愿见到因官方、首脑意见的对立、国际政治格局变化而使中日关系受到难以恢复的巨大伤害。而与政府官方难以退却的“硬”的一面相比，民间的态度与做法，则具有“软”性特点，成为两国之间可进可退、不致于走向死胡同的可操作空间。

思考留日预校的地位与作用，尽管是中日两国政府合办，具有半官方的性质，但作为教育机构，毕竟民间交往的特色更强些，越是两国之间处于困难时期，就越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其作用。说句过头的话，即便处于交战状态，也应当保留对话与沟通的渠道，这是各国政治家层面的智慧。

据徐冰回忆：“准确的记不清了，大约2004或2005年前后，可能因日本方面财政困难，抑或是因为中国青年的反日运动，从日本方面传来了要求停办留日预校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声音。²⁴⁾所谓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其前身就是俗称的“大平班”，起点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急需学习日本的高科技与精准高效的企业管理，民众迫切想了解日本的需要等原因，形成了日本热、日语热。而据中国教育部统计，当时中国高校的日语教师，大约有600名，且水平参差不齐，远远难以满足办学的需要，于是就向日本方面提出帮助中国培养大学日语教师的请求。日本方面积极响应，根据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按每年培训120人的规模，日本方面派遣一流学者来华任教，与1980年在北京语言学院设立了“教育部高校日语教师培训班”，实施5年，把中国的大学日语教师整个培训一遍。因该项目是由曾陪同条中角荣访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劈山开路、后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的推动，故俗称“大平班”。

而当5年计划按期完成后，教育部发现全国的日语教师已增加到2000名，而除了日

24) 同上5

语，还需要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于是经双方商定，将该项目延续，办学地点改到北京外语大学，名称变更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不论“大平班”还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日语界和日本研究界，均具有重要影响，被誉为“日语界的黄埔军校”，其毕业生大都担当各大学日语学院院长、副院长、日语系主任等要职，可以说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学霸，执中国日语教育界牛耳。他们的徒子徒孙遍布全国。

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和“大平班”是中日教育、文化交流的第一和第二大的项目，而因一时的财政困难或某种波动就取消，实在可惜。我的东京大学的导师竹内信夫先生，时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曾跟我谈过当年的烦恼，为保留该中心多方协调努力。时任留日预校校长的李若柏教授，当年也找我商量对策。”²⁵⁾

2014年，留日预校又面临能否继续办下去的困难，因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和内部管理的一些问题，日本方面的积极性有所减弱，学校调整了预校领导班子。经过新老成员的共同努力，加强了对日沟通与交流，以东北师大校长刘益春、副校长韩东育为首的代表团2015年2月访问日本文部省，与文部科学省确立了继续办学、大力推进留日预备教育的方针，遂使留日预校跨过危机，复入正途。2015年，留日预校因“对日中教育交流所作的贡献”，获日本外务大臣奖。

谈到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还得赘言几句访日的中国游客。尽管中国游客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受到全世界的批评与诟病，但不得不说，他们对刺激日本的消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真金白银的流入，让日本人一时容忍了他们的无礼和嘈杂，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访日游客的一个潜在作用，就是因了他们的访日，其观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日本观。如前所述，在以往通过教科书及媒体上接受的日本，大都是当年的日本兵，即中国人所说的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不思悔改，依然想侵略中国。而到了日本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日本社会整洁有序，日本人彬彬有礼，和善热心……。就连骨子里都强烈反日的人，回国后都对日本交口称赞。

可以说，与两国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刻意寻找对方的缺点拿来说事、以抹黑丑化对方为乐趣的做法相比，中国访日游客通过自身的观察，肯定会在调整心目中对日本印象，这对于缓和中国民众的误解，进而加深两国的相互理解，无疑具有正面作用。

回顾历史，反观今日，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尽管迄今只有微不足道的37年，但其作用和贡献不可忽视。毕业生通过学习日本的高科技，今天大都居于中国科技界金字塔的顶端，为中国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来说，盛唐时期的遣唐使，推出了古代中日交流的一代高峰；而当今的留日预校，作为战后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最大项目，培养了14000余人，日本老师也先后有500多人来华任教，他们增加

25) 同上

了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许多老师与其学生乃至其家人建立了终生不渝、甚至延展到后代的友谊，这种人脉关系是中日两国实现民族和解的宝贵财富的一部分，从这点来说，与唐代只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情形相比，以留日预校为代表的中日交流，又具备了双向性的特点。中日之间，只有互惠双赢，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留日预校不论将来的前景如何，其为两国和平友好所做出的努力，将永续流芳。

参 考 文 献

- 余子侠《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对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中日教育文化交流における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備学校の役割と可能性』（財団法人 大平正芳記念財団 環太平洋学術研究助成）2011 年 1 月
酒井順一郎 『改革開放の申し子たち』冬至书房 2012 年 10 月
郑国爱 张群舟 马军合编《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在中日教育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张群舟主编《时光的印记 辉煌的篇章 - 纪念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成立 35 周年》东北师大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本稿は、熊本学園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の平成 27 年度海外調査助成金の援助を受けました。この場を借りて感謝いたします。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備学校について

李 珊

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備学校（略称：留日予備校）は、中日教育交流協定に基づいて1979年3月に长春市東北師範大学内に設置された、戦後の中日文化教育交流最大の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る。留日予備校はこの37年間に、日本文部省奨学金学生4000名を輩出してきた。また、同校内に設けられた新疆教育委員会委託班、長春第一自動車育成班など様々な研修班は、日本語の学習を通して日本への留学生や対日交流、日系企業で働く人材など、日本と関わりを持つ人材、総勢14000余名を養成してきている。一方、日本からはこれまでに、東京大学を初めとし東京外国語大学、東京工業大学、一橋大学、岡山大学などの各大学から教師ら500余名が同予備校に派遣されて、中国人教師とともに学生の育成指導に当たっており、日中両国の文化教育交流において多大な貢献をしている。

小論は主に酒井順一郎の『改革解放の申し子達』（冬至書房 2012年）、鄭国愛、張群舟、馬軍共同編集の『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備学校の中日教育交流における地位と作用』（東北師範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を参考文献として、現当学校常任副校長の徐氷教授に対して行ったインタビューを用い、更に新資料を補足して、留日予備校の成立背景や歴史沿革の断片とその歴史的貢献を総括したい。その後小論のまとめとして留日予備校の将来を見通し、今日の中日関係における緊張と対立が、当学校及び中国の日本語教育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て分析する。